

## ● 文史钩沉

## 元宝茶的渊源探究

以前过年时都有上茶馆喝元宝茶的习惯。当茶伙计上茶时,高喊着“送元宝喽”,客人们得此好彩头,往往会多给几个赏钱。客人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聊天,谈着家长里短,也规划着新一年的生活。

江南一带的水乡城镇,茶馆茶铺或东家西房,曾经多有元宝茶列在茶单或者自家备着茶叶和橄榄,点上一壶或随手一冲,就可以享用起来。只是随着工作甚至生活节奏的变快,这道茶,也见得少了。

元宝茶,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的南方地区,宋朝诗人陆游在游历南方湖村时,在《夏初湖村杂题》写下“寒泉自换菡蒲水,活火煎煎橄榄茶”的诗句,其中橄榄茶即元宝茶。由此可见,元宝茶的习俗在宋朝便已经形成,距今至少有700年历史。

从上海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习惯等综合状况来看,孕育元宝茶顺理成章。可以说,上海是元宝茶的发祥之地。

从上海历史看,从唐代开始,因商业、航运等较发达,人口开始密集,唐天宝十载(751年),吴郡太守奏准设立华亭县,开始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立嘉定县,上海地区始有两个独立行政区划。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府,次年改称松江府。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立,也辖于松江府。从建制看,上海地区有孕育自己民俗的基础。

从茶文化看,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朝时期,茶已成为“家不可一日无也”的日常饮品。南宋迁都至杭州,把宋代的茶文化中心,移到江南地区,影响了上海地区。中国茶文化历史大致分为先秦、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明和元明清五个时期。汉魏时期采用煮茶法,隋唐用煎茶法、点茶法,宋朝采用点茶法,元明清采用泡茶法。茶的历史大致从多种食物一起食用演变到清饮。在西南边陲,目前还有打油茶,如贵宾来访或重大节日,一般都以打油茶招待。现在上海地区虽然以清饮为主,但在传统节日——春节,还是要喝中华民族古老的元宝茶,再配上中华家风、家俗文化。上海可以说是元宝茶物质和文化的交汇点,如此伴随着航运和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元宝茶这一民俗逐渐在上海地区孕育、发展,并以上海为中心点,逐步渗透到江浙皖赣等江南地区,成为人们春节习俗的一部分,为民众所共有的生活习俗。

从元宝茶所用的橄榄看,上海是橄榄的重要转运地之一。老上海习惯称之为檀香橄榄,其主要产于福建江下游两岸,通过海运经过上海码头流向江南各地。早在公元746年的唐天宝年间,唐朝就在这控江襟海处设立镇治,即青龙镇(今青浦区东北,苏州河南岸),发展港口,供船舶往来停靠。进入宋代后,青龙镇有“江南第

一贸易港”的称号。南方福建等地货物也有很大一部分通过青龙镇。1111年,北宋政府在此设市舶提举司,征收关税,管理航运。1404年开拓形成黄浦江。所以,上海是有孕育元宝茶的环境。

再从上海(闲)话看,也较符合元宝茶文化。“青橄榄”用上海话讲“请过来”。橄榄,上海闲话也称“大福果”“元宝”。

从元宝茶的现存布局看,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如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成为当时家家户户在春节时待人接物必备的茶。明代正德《建昌府志》记载:“人最重年,亲族里邻咸衣冠交贺,稍疏者注籍投刺,至易市肆以青果递茶为敬。”清代同治《广昌县志》记载:“(元旦)乡邻往来投刺,以青果递茶为敬。”清道光《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很多传统习俗消失了,但元宝茶这一习俗,在春节里必泡的‘年味茶’。”

在社会公共空间,以前过年时都有上茶馆喝元宝茶的习俗。当茶伙计上茶时,高喊着“送元宝喽”,客人们得此好彩头,往往会多给几个赏钱。客人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聊天,谈着家长里短,也规划着新一年的生活。

## ○ 张荐茗

的生活。一般情况,茶越喝,人越多,邻里乡亲便聚集起来,形成一种热闹喜庆的生活场景。除茶馆外,餐厅、戏院中,也处处可见元宝茶的身影。餐厅上菜前,会先奉上元宝茶,表达对客人的新春祝福。在戏院中,大家也是一边喝元宝茶,一边听戏。元宝茶在不知不觉中,已然成为一种年味茶。

寻年味,传年俗,全家共饮元宝茶,祈福家宅平安,万事如意;大年初五,迎财神饮元宝茶,祈福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正月十五,元宵饮元宝茶,祈福合家团圆、财源滚滚。

如今,元宝茶虽然少见,却也不是绝迹。

在上海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我所创造的“老上海茶馆”的茶空间,二十年来就一直有元宝茶,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创新。在上茶的时候,茶盘上摆放了一根橄榄枝,这样,跟老外解释起来就容易多了:这是“和平茶”——茶和天下,和气生财。他们听了都翘起了大拇指。它使原来家和、族和、邻和,发展为国和、天下和。

虽然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多,很多传统习俗都消失了,但独有元宝茶这一习俗还是深深地扎根在了上海人心里,每年春节人们还会到茶馆来喝元宝茶。由此可见,渗入日常生活的饮茶风俗元宝茶,既有独到的文化价值,也具有长远的生命力。

张荐茗,静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元宝茶代表性传承人,上海老茶馆创始总经理。

## ● 文博掠影

## ○ 施泳峰

## 江汉美玉耀申城

玉器在新石器时期已经为华夏先祖所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华夏大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它璀璨的身影。早在五千年前,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原始先民们,已经从掘土、伐木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玉器是“美而不朽”的石头。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相信玉器含有天地之间的“精气”,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阳阴之气”的模样,雕刻出玉璧与玉琮,以及神祇、祖先的形象,渴望经由“制器尚象”,发挥出“同类感通”的法力,与宇宙苍穹对话。他们相信万能的上苍派遣神灵,将生命引渡到人间,繁衍出万物生灵,由“万物有灵”,发展出中华文化特有的“玉文化”。

繁复神秘的纹饰赋予了玉器独特的象征意义,玉器的“敬天格物”代表着权力,《周礼》更是将玉器纳入到典章制度之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方”。同时,玉制的工具与兵器也成为商周时期贵族身份的象征,开启了玉器“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气象。佩戴玉饰的风尚源于新石器时代,此后人们相沿成习。岁月悠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价值也在民族融合与时代变迁之中不断变化。人们相信配戴雕琢了龙、凤、虎、鹰的玉饰,不仅可以彰显自身的“德性秉赋”,而且还被儒家经籍诠释为具备“仁、礼、智、信”的“君子之德”。玉佩饰大为发展,历代玉佩饰既有传统的延续,又有众多的创新,蔚为大观。

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一波波来自异域文化的洗礼,玉器褪去了“以玉通灵”的神秘色彩,摆脱了“以玉比德”的儒学教条,隋唐宋元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他们热衷于和谐自然,崇尚人文,追求写实,在追慕古礼、强调法统的心态下,兴起了玉器的仿古之风,玉器的“人文化”、“世俗化”、“平民化”趋势明显。用于摆设观赏的玉雕便登堂入室,广受欢迎。这类器物体积较大,多为圆雕、浮雕和镂雕工艺,题材广泛,涉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山水仙境、吉祥图案等,强调绘画的意境和笔墨的情趣。

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高度发达,在文人富商的襄助下,我国的玉雕技艺益加精湛细致。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征服天山回部,直接控制了新疆和田玉料的开采,清代的玉雕艺术更是空前繁荣,以形神兼备的写实手法,珍品迭出,各领风

骚,攀越上我国玉雕艺术的历史高峰。

江汉平原由长江和汉江冲击形成,位于我国“千湖之省”的湖北省中南部,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江汉平原上已经出现原始人类活动的遗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构成了江汉平原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的主体。考古发掘证明,石家河文化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文化玉器雕刻的最高水平,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精细,造型优美,加工技术成熟,神灵观念突出,显示出玉文化已经极为发达。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于江汉平原,“熊通子文王熊贲迁都郢,有地千里”。楚国的国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依托江汉平原的富饶资源,楚国迅速崛起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江汉平原上发现了“熊家冢遗址”,这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陵园分布最完整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国内的考古学家一致认定,“熊家冢遗址”的墓主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某位国君。此墓主人身份之显赫,车马阵容之豪华,祭祀场景之阔绰,布局系统之完整,在国内极其罕见,所以我国的考古学界有“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之说。

在“熊家冢遗址”出土的随葬品以玉器为主,出土玉器三千多件,器形有玉璧、玉璜、玉环、玉珠、玉管、龙形玉佩等,出土的玉器种类和制作工艺都达到了同时期的最高水平。楚国玉器中的佩玉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玉器发展史上的巅峰产物,以独特的文化审美和高超的制玉技艺备受世人瞩目。

近期,“天地精灵,璀璨江汉——武汉博物馆馆藏玉器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玉器形制丰富,有武汉博物馆珍藏的110多件历代玉器,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是历久弥珍的中华瑰宝。

作者系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上海市文博(三级)研究馆员,上海市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人员,上海市文物局涉案文物鉴定人员,上海市文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

## ● 往事如歌

## ○ 何振华

## “巳巳”长安

## “振华贤棣:

信收到。你不要来,也不要出门,千万小心这个季节是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必须提防,少工作,多睡眠,勿兴奋。

我近来也不健,天天怕脑溢血,此病近来也发得多,每天上午睡到十点,看看报纸、杂志,不用笔。

我再提一提,你不要来!像我一样:‘蜃存’。

## 北山,1995.12.5”

这是施蛰存先生写给病中的我的一封信,距今整整三十年。先生生于1905年,今年是先生诞辰120周年。先生祖籍杭州,白娘美丽的传说,将蛇在中国文化中的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先生当年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包括他写的小说,都被贴上了“新感觉派”的标签,甚至戴上了“前卫”的桂冠,但自始至终,他都不承认自己有造成某一种文学流派的企图或放任他所编发的作品形成什么流派。在我的心目中,这种完全从作品本身价值出发并依照个人的主观为标准的态度,体现的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精神。从先生出生的1905年这个乙巳,到现在2025年这个乙巳,两个蛇年,两个甲子,在中国的文艺苑,有没有出现过真正“笔走龙蛇”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

就在先生给我这封信的1995年,标之曰“东方精神”的米罗画展,轰动京沪。当时我两次观展,先生嘱我带一套米罗画作明信片给他。他问我,有没有看出来米罗的画有东方精神?我老老实实说,我看不出,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明明是“超现实主义”的米罗,硬装上“东方精神”

的榫头。先生说,看毕加索晚年的画,有中国水墨画法,张大千常用泼墨法,他在巴黎见了毕加索,毕加索不算超现实主义画家,但他的许多作品很明显是受了超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至于用泼墨法,倒是可以说这恰恰缘于“东方精神”呢。先生写了一篇随笔,托我送交《解放日报》的老编辑陈昭,发表在“朝花”副刊上,对当时报纸上介绍米罗作品的那些不免“瞎子摸象”的宏论,先生切中肯綮的批评,无疑教人服膺。

前些天偶过南京西路上的历史博物馆,这座钟楼建筑1996年的时候是上海美术馆。而今很少有人会提起上海美术馆的旧址,其实在迁入钟楼建筑之前,名为“上海美术展览馆”,建立于1956年,1980年代翻建过一次,位置就在钟楼建筑对面的“仙乐斯”西侧。从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我说不清有多少次去那里观展。印象很深的两次,一次是看齐白石画展,一次就是看米罗画展。

古往今来,神话世界里的龙蛇共舞,一直象征着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智慧、灵活、神秘及生命力。先生说过,对于世上一切具体景物,我们每个人的观感效应都经过一系列思想感情的不自觉的心理活动过程,这种心理活动,并不为任何美学的或道德的成见所干扰。

承载着人们“巳巳”长安美好希望,蛇年新春前后,上海有一场接一场的大展面世,不啻文化的盛宴。今年,也是冯至、洗星海、戴望舒、焦菊隐以及萨特、亨利·方达、葛丽泰·嘉宝120周年的诞辰。在纪念这些大师的特殊年份,我视为超越生活现实的超现实主义“年味”。



蛇来运转 (海派剪纸)

李守白

## ● 世说新语

## ○ 朱少伟

## 蛇年说蛇

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其中的“它”,即“蛇”的古体字。在远古,人们过着洞居或巢居的生活,毒蛇防不胜防,遂形成一种习俗,碰面总会心有余悸地地问一声:“无它乎?”后来,因蛇被视作“长虫”之一,又在“它”的基础上加个“虫”字偏旁,演化为今天所见的“蛇”。

在先民眼中,蛇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如战国后期的《荀子·劝学》有“鼈蛇无足而飞”之语,“鼈蛇”亦称“飞蛇”,相传能兴云雾而游其中;无独有偶,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也谈到,阿拉伯半岛生存着一种长翅膀的“翼蛇”。而且,蛇还是我国传说中的神兽——龙的主要原型,东汉王充的《论衡》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南朝齐祖冲之的《述异记》说:“水虺(按即水蛇)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

金蛇吐祥  
(篆刻) 张海涛

